# 中国青铜时代的酒文化

丁　孟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研究馆员

青铜时代是华夏文明形成的最初阶段，一般来说后世很多的文明成果都是在青铜时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括对当今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酒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成果的一部分，在青铜时代就已经形成。

言及中国青铜时代，治史者无不惊叹其酒事之炽烈。然而，当时人饮酒，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饮啜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整个青铜时代文化史的缩影。研究青铜时代的酒文化，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青铜时代的社会。

## 「酒」字的肇始与酒器

酒字最初写为酉。甲骨文写作、等，在已出土的殷商卜辞中大量出现，显然是当时的基本字之一。不过从已破译的文句看，此字有明显不同的三种含义：一是表示十二地支之一的酉；二是表示酒食之酒；三是用作地名。酉字字形像盛酒之器，故多数甲骨文学者认为其字本指盛酒器，后引申为饮用之「酒」，再后才兼指地支的酉及其他。在此后的金文及石经文字中，酒均写作酉，说明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古人一直以酉为酒。直至汉以后，从水从酉的酒字才正式出现，取酉而代之，并逐渐固定下来。

关于酒的起源，我国古文献中记载颇多。《世本·作篇》：「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杜康作酒，少康作秫酒。」《战国策》中也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至晋代江统著《酒诰》时则较为笼统地说：「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这里且不论始作酒者是上皇，或是仪狄、杜康，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古人已把酒的起源追溯到我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

从考古学角度考察，早在六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远古先民就已经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酒文化。大汶口遗址发现的酒器也很多，各种酒器二百四十九件，其中陶尊三十件，陶鬶三十件，陶盉十八件，陶杯一百七十一件。（据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大坟口》，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大汶口文化遗址酒器的大量出土，为我们探讨酒的起源提供了较早且有力的证据。到了龙山文化时期，不仅酒器的制造较大汶口文化时期更为精致（酒器造型除了蛋壳陶高柄杯外，还有陶鬶、陶罍、陶盉、陶瓒、陶尊等），而且从器形上来看，有些型制和青铜时代的同类器物接近，很明显具有上下承接的关系。



**商　二祀邲其卣**

通高三五・四厘米　宽三六・九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商　网纹三足铜爵**

通高二五・八厘米　宽一七・一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商　竹父丁盉**

长三一厘米　宽二五・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商　兕觥**

长二六・五厘米　宽二三・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商　亚酗方罍**

高六二・二厘米　宽三七・六厘米　口径一六・九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商　册方彝**

高二八・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商　駁癸觚**

通高三〇・九厘米　宽一六・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 阅读链接：青铜酒器知多少

根据容庚、张维持所著《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月版）第五章“青铜器类别说明”中的“二、酒器部”，将殷商青铜酒器分为五门，分别是煮酒器门、盛酒器门、饮酒器门、挹注器门和盛尊器门。下再分类，共计二十三类（文中的尊与鸟兽尊合为一类）：

**煮酒器**

**爵**　造型特点是有流、尾，旁有鋬，上有二柱，下有三足。青铜爵出土、传世文物数量较多，可见其为常用之酒器。容庚据其所藏一件父乙爵底部有烟灺痕迹，推断爵应是煮酒器，其上二柱为手把之用（功能类似鼎的直耳），无柱造型的爵当为初期雏形。

**角**　造型似爵而无柱，两端有长锐的角，并无流尾的区别，有的还配有盖，应该是爵的一种。角是低级别贵族用来喝酒的器具，《礼记·礼器》云：“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其出土数量远少于爵。

**斝**　造型与爵、角类似，没有流与尾。斝这种器物虽然总出现在出土、传世青铜礼器之列，但并没有哪一件斝自铭为“斝”，罗振玉怀疑《礼经》中所谓的“散”即为斝，王国维则力证此说。《礼记·礼器》云：“尊者献以爵，卑者献以散（斝）。”可知斝的等级比较低。

**盉**　造型大腹窄口，有流、鋬，上有盖，下有三足或四足。盉是用来调和水和酒来实现浓淡调节的酒器。

**鐎**　《韵集》云：“鐎，温器也，三足有柄。”造型与盉类似，容庚所著《殷周青铜器通论》中仅举实物一例。

**盛酒器**

**尊**　造型大口、圈足，与觯、觚类似，三者很难区别，只是大小的分别，大者即为尊。还有的尊做成鸟兽的形状，立体而生动。尊在礼器中的地位仅次于鼎，用于祭祀。最有名的青铜尊当属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四羊方尊。

**觥**　造型椭圆或四方，圈足或四足，盖多做成兽头，或整器做成动物形。觥是饮酒器中容量较大的器型。宋代《博古图》、《续考古图》将之与匜混淆。

**方彝**　造型似尊，有盖，盖形如屋顶。一般自铭为“宝尊彝”或“宗彝”。彝也是青铜器的统称，《周礼》有“六彝”之称，其实是六种不同的青铜器，比如“鸡彝”就是盉，斝彝就是斝等，故而后人对彝的辨识产生了一定的困扰。

**卣**　造型一般为椭圆大腹，细颈有盖，有圈足、提梁。卣的出土数量多，证明其为一类重要且实用的青铜酒器。

**罍**　造型似壶（商代晚期出现过方形的），或也作为水器使用。

**壶**　式样繁多，使用年代持续较长，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都是青铜器类中的经典器型。

**瓶**　作为盛酒与汲水器，多被冠以“壶”之名，盖因壶与瓶在古代没有什么区别。容庚《殷商青铜器通论》中将瓶的型制定为“形似壶、罍而无足”。有一自铭为瓶的春秋早期青铜器称“孟城瓶”，算是青铜瓶的代表器物。

**鑵**　和壶、瓶为一系，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西周时期的仲义父鑵，算是此类青铜酒器的代表。

**缶**　传世遗存中自铭为缶的只有一九五五年河南寿县蔡侯墓出土的四件青铜器，其中两件自铭“盥缶”，两件自铭“尊缶”。为后世提供了青铜缶的标准样式。

**甗**　《广雅·释器》：“甗，瓶也。”传世遗存中自铭为甗的只有容庚《殷商青铜器通论》中提到的“国差甗”。

**卮**　多为筒形，亦为酒器。卮酒，即一杯酒。

**皿**　既是食器，也可做酒器。《殷周青铜器通论》中记载自铭为皿的器物只有战国时期的一件“宁皿”。

**匜**　形似壶，腹部扁圆，《博古图》称“匾壶”。《西清古鉴》记载有一件自铭为匜的传世遗存称“长匜”。

**饮酒器**

**觚**　长身、细腰、阔底、大口。殷墟出土很多，且多与爵、斝等成组出现。

**觯**　形似尊，容量较小。《礼记·礼器》云：“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可见觯是贵族所用的饮酒之器。

**杯**　型制椭圆，旁有弧形耳，《西清古鉴》收录有一件“羽觞”，当为此类器物。后世杯的质地多为瓷、玉等，洛阳出土战国甘旂子杯算是少见的银杯。

**挹注器**

**勺**　这里所说的勺的型制是体圆中空，有长柄。出土器多与尊同见，应是用来从尊中挹酒再注入爵中。现今在一些造酒作坊之中还能见到这种用来提取、勾兑酒浆的长柄勺。

**盛尊器**

**禁**　长方形，有足或无足，有足称“禁”，无足称“斯禁”。用来盛放酒尊。传禁是周朝天子为告诫后人不要重蹈商人饮酒无度最终误国而命名的酒具。青铜禁出土稀少，仅有六件：一件现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一九三四年陕西宝鸡斗鸡台墓地出土）；一件现藏陕西省博物馆（二〇一二年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一件在日本大阪；一件现藏天津博物馆（陕西出土）；一件现藏河南淅川县博物馆（河南淅川下寺二号楚墓出土）；一件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 青铜时代酒文化的繁荣

发展到二里头文化时期，除有大量的爵、斝、爵、盉、觚、角等陶质酒器以外，还出现了青铜酒器爵、角等。从夏代向上溯源，不难看出，青铜时代酒文化的繁荣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数千年来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谈到酒，古人们更多是从政治观点上考虑，认为饮酒会导致亡国或产生祸患等等，把饮酒这一行为同国家的政治命运、统治者的德行相联系。据《战国策》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而亡其国者。』」大禹「绝旨酒」，并因此疏远了酿酒的仪狄。这可以算有记载的最早关于禁酒的命令，后世不少帝王贪酒灭国，则完全应验了大禹的预言。人们通常认为，在大禹之后的夏朝末代君主桀，就是由于嗜酒无度而导致亡国。（虽然其亡国除嗜酒外还有很多缘由，但是这确实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古列女传》说夏桀招众多美女纳入宫中，「日夜与末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桀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辖其头而饮之于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为乐」。（吴玉贵、华飞主编《四库全书精品文存》第三十卷「古列女传」，卷一七「孽嬖传·夏桀末喜」，团结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这也说明设酒池「牛饮」的做法，并非始于商纣，夏桀时就已经有。

## 商人的嗜酒之风

商人嗜酒，不仅有文献可寻，而且也越来越多地为考古资料所证实。《史记》谓纣王「以酒为池」。《正义》引《六韬》云：「纣为酒池，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除去其诞漫的成分，我们认为其说也并非是子虚乌有。吕思勉在《中国制度史》中据《礼记》所载「汙尊而抔饮」及郑注「汙尊，凿地为尊也。抔饮，手掬之也」，认为凿地而饮是氏族社会合食的遗俗。只不过当时所饮用的是水，至后人掌握了酿酒的技术，才以酒代之。由此可见，商人「崇饮」、「牛饮」、「群饮」风习，都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的。

《尚书·酒诰》说，殷商都邑内「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把商人的亡国归咎于酗酒，虽系夸张之辞，但也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尚书·微子》也说纣「沈酗于酒」。《微子》与《酒诰》在对「酒」的谴责上可谓前呼后应。周初青铜器大盂鼎铭曰：「我闻殷述（坠）令（命），隹（唯）殷边侯田（甸）雩（与）殷正百辟，率肄（肆）于酉（酒），故丧师。」一般认为，武王伐纣的胜利，得力于商王朝倾力经营东南（东夷）而造成的内部空虚，但酗酒对殷王朝实力的削弱也是不言自明的。

实际上，纣以前的诸王对酒同样有特别的偏好。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到，武丁（商王盘庚之侄、商王小乙之子，商朝第二十三任君主，在位时间约公元前一二五〇年～公元前一一九二年）时曾用大量的酒祭神。如武丁时卜辞记他一次就曾用一百卣的鬯酒（祭祀用的香酒）为祭：「贞昔乙酉葡旋御（于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羌三百（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三〇一，中华书局，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二年版）

卣是专门用来盛鬯酒的容器，大小不一般可容酒二至三公斤。按「百卣」计算，每次用酒量应达两百至三百公斤——武丁时以每次一百卣为祭，用酒量十分可观。

商代青铜酒器，包括爵、角、觚、尊、觯、卣、罍、盉、觥、斜、彝、壶等，不仅是商时人们饮酒的器皿，更是当时社会历史的见证和缩影。围绕这些青铜酒器发生的系列现象，人们把它称作「酒文化」，而这些琳琅满目的各种酒器就成了研究与反映这种酒文化的主体和平台。在它们的后面，往往隐藏着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 酒与商人的饮食

从目前已发现的十余万片甲骨文卜辞考察，殷人作为食品献祭的主要有三大类：一是粮食，如禾（粟）、秫、黍等；二是酒类，如上述之鬯、醴、等；三是肉食，如牛、羊、猪、犬等。向神灵献祭的物品，应是以现实生活中实际需要为依据的，甲骨文中描述的献祭祖先的食物构成，亦是商人食物结构的反映。

商人嗜酒，粮食作物的主要品种除部分用于祭祀外，大量被用于酿酒。而卜辞中的黍字的出现明显多于其他作物类文字。商人重视黍的生产，是与其嗜酒有关。在商人心目中，黍显然是最好的谷物，主要为统治者所享用，而且大部分用来酿酒。禾本义指谷子，即粟，去皮则称为小米。粟中的上品称为秫。《说文》：「禾，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时之中，故谓之和。」禾应是造醴酒的主要原料。至今，中原地区仍有以小米做甜酒的食俗。

畜牧业是商人的传统经济行业，其畜养牲畜的目的，主要是获得肉食产品。据杨升南《商代经济史》所述，商代家畜的品种有马、牛、羊、猪、犬、象、鹿等，并有鸡、鸭、鹅等家禽，均是商人肉类食物来源。商人获得肉食的另一手段就是狩猎，从卜辞记录看，其猎取野兽的数目相当可观。狩猎活动作为肉食需要的补



**商　鸟纹爵**

通高二二・一厘米　宽一七・一 × 八・一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商　父己角**

通高二〇・五厘米　宽一六・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商　山妇觶**

通高一七・五厘米　宽六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商　兽面纹三足杯**

故宫博物院藏



**商　王之女叡方彝**

通高二九・五厘米　宽一八・六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充，在当时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丰富的肉食来源，使得商人可以不依赖粒粮为主食，因此，当时的粮食生产得以满足举国盛行的嗜酒需求。

## 酒与商人的信仰

商人嗜酒的习俗，事实上也是频繁祭祀活动的衍生。商人的祭祀活动相当繁缛。《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其事神活动频繁、复杂，巫术盛行，且极具权威。统治者在决事之前，首先要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辞中，有相当数量的祭祀卜辞。商人所尊崇的鬼神很多，不仅要祭祀诸如山、川、风、雨等各种自然神祇，还要祭祀先公、先王、先妣等宗主神，更要祭祀「上帝」这个至上神祇。商人以宗教治国，占卜、祭祀权自然牢固地掌握在商王贵族手中，成为有力的统治工具。

在各种祭祀活动中，酒是不可缺少的神圣之物。酒活跃在各种宗教仪式上，上至王公、下至庶民都离不开它。所谓「崇饮」、「群饮」的场面，也只有祭祀的场合才会出现。酒与宗教的关系如此密切，商人的宗教祭祀又如此频繁，那么，商人嗜酒的习俗亦当有其深刻的宗教意义。

商人借助酒精的力量达到昏迷状态以与神界沟通，有史料为证的，史料记载了酒器的数量与种类的繁多，「崇饮」、「群饮」的嗜酒风俗，酒与祭祀的戚戚相关等。《尚书·酒诰》中，虽然周公以商人嗜酒为戒，却一再地说明「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就是说告诫文王的子孙要喝酒只能在祭祀时喝，祭祀时不但可以、而且应当喝酒。

## 西周的酒礼

西周建国初期，周公颁布一系列政令禁酒，防止因饮酒而亡国失政。自国家产生以后，统治者就用礼来规范社会生活，在西周时期更形成较完备的酒礼，明确社会的等级差别。可以说中国古代酒文化的发展始终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在《周礼》、《礼记》、《仪礼》等书中都有关于酿酒原料、技术以及饮酒礼仪的介绍。



**西周　夔纹铜禁及各式青铜酒具**
陕西斗鸡台古墓出土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 酒与礼仪

酒从很早之前开始，便与维护社会秩序的「礼」密切相关。周代已称王所赐酒为「礼酒」。礼字与解释为甜酒的醴字音既相同意义也相通，这绝非巧合。

为防止饮酒过量而失礼，古人也制订了一套办法，称为「酒礼」。在朝廷宴席上专设有监督礼仪的职官。《诗经·小雅·莆田之什·宾之初筵》中描述道：当与宴者未醉时，仪表庄重，举止得当。而一旦喝醉，则轻举妄动，举止失措，甚而失去仪节。最后写道：「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监，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解反耻。……三爵不识，矧敢多又。」就是说宴席上有监察礼节的职官和史官，与宴者有的适可而止，有的却喝多了。醉了本来不好，却反以不醉的为耻。他们对君臣小宴以三杯为限的礼制都不懂，且敢多次劝酒。《史记》中的一段记载，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相传齐威王问淳于髡酒量如何？淳答：一石能醉，一斗也能醉。问其缘故，淳说：饮大王所赐之酒，「执法在前，御史在后，髡恐惧」，因而喝一斗也能醉。若在朋友家畅饮，自然酒量就大。酒与礼的关系，主要还是表现在饮酒是一些礼节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项目，正如《诗经·周颂·臣工之什》中《丰年》描述的：「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就是说丰年收获糜子稻谷万千亿，修起高高的粮仓。酿成白酒和甜酒，献给祖先，以及作为祭祀百神和宴飨宾客的各种礼仪之用。酒是专门作为礼仪用品而生产的。

## 酒与乐礼

周公用礼来规范社会上一切活动，还形成了特殊的乐礼，酒筵的同时要以乐来助兴，但同时要不失尊卑长幼之序。在宴会之初，先演奏鼓瑟，然后合乐演奏《周南》之中的《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采蘩》、《采苹》，有起兴之意。到酒筵快结束、宾客已酒足欲归时，要奏《陔夏》，作为酒筵的结束曲。我国古代的音乐发展之初，就是为了配合礼而促其有序，特别是在饮酒过程中，以音乐助兴，可以时刻提醒人们不要失礼，不要饮酒失节。

## 春秋的饮酒与射礼

春秋时期以礼会民，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需时时刻刻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可逾礼。为丰富饮酒活动而创造的燕射，与之相对应便有射礼，射礼属于州序（州学）之礼，是五礼中的嘉礼。君主以嘉礼亲万民，平民以嘉礼亲朋友。在周代《仪礼》中就有射礼，在酒宴进行到高潮时，由主人推选出一人主持燕射。「司射适堂西，袒、决、遂，取弓于阶西，兼挟乘矢，升自西阶，阶上北面告于宾，曰：『弓矢既具，有司请射。』」（《仪礼注疏》卷十一「乡射礼第五」）具体的做法是放置一个标靶，大家轮流离



**战国　鸟饰勺**

通高八·四厘米　宽一五·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席射箭，以射中箭数多少来决定胜负，胜的人回到座位上坐着饮酒，输的人要站立着把酒喝尽。先秦人们通过燕射不仅可以丰富娱乐生活，从另一方面讲也是以礼制规范生活。还有一种酒筵时的娱乐活动就是投壶。「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执壶。主人请曰：『某有枉矢哨壶，请以乐宾。』」（《礼记》「投壶第四十」）以投中的多少来决定胜负。投壶举行的地点要根据主人的安排而定，可以在室，也可以在堂或者是在庭，地点不固定。

## 酒文化在青铜时代的影响

青铜时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滥觞，这一时期形成并逐渐发展繁荣的文化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青铜时代人们不仅发明了酿酒技术，而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酒文化，直至今日，酒文化依然在当今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席位。

青铜时代的酒文化不仅是酿酒技术，还包括与酒相关的政治、经济等等方面。为了规范人们饮酒时的行为，在青铜时代就有《礼记》、《仪礼》等来引导人们的行为，防止酒后失态，今天仍然可以看到那个时期酒文化这些约定俗成的痕迹。

自古以来中国就以「礼仪之邦」自居，传统的礼仪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有君臣上下的礼仪、长幼尊卑的礼仪、宴请宾朋的礼仪，婚丧嫁娶的礼仪、节日庆典的礼仪等等，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酒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自然有其独特仪节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酒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酒礼，在《礼记》中有很详细的介绍，上到帝王君主，下到平民百姓都通过酒礼来维系一种和谐的秩序。适当的饮酒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但饮酒过度就会让人失礼，有了酒礼的规范，古人在祭祀、庆典、宴飨以至日常生活中都有礼可依，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可以通过饮酒来沟通感情，同时又不失礼节，维持和谐的氛围。



**战国　错金嵌松石卮**
通高一五・三厘米　宽一二・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